

# 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书史研究

王 红 元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发达的国家一道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是在书籍的产生过程中，我国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发明，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书籍的产生、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显明标志。恩格斯在论述史前各文化阶段时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sup>①</sup>

本文拟就建国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对有关书史的重要文物在书史研究中的意义作初步探讨。

## 文字与书写材料

书籍产生的首要条件是文字的发明。过去有人认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我国最古的文字；有人认为甲骨文已进化到形声文字而推断在此以前一定还有初级阶段的文字，但苦于没有实物例证。

一九五四年发掘的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遗物上的二十二种简单刻划<sup>②</sup>，是文字还是符号，至今学者们还

<sup>①</sup>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sup>②</sup>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没有统一的意见。一九五九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图象文字<sup>①</sup>，为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把我国文字的历史上推了近两千年，与世界上最古老的距今已五千多年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出现时间相仿。

有了文字以后，还需要有适当的书写材料才能构成书籍。在我国纸没有发明以前，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人民都曾努力寻找过各种书写材料。印度人用过棕榈树叶和树枝，巴比伦人、亚西利亚人用过泥板，埃及人用过纸草，罗马人用过蜡版，小亚细亚人用过羊皮<sup>②</sup>。我国古代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用过陶器、甲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缣帛等等。以上这些材料，比较普遍，较易获得。在贵重的材料如金、玉等上面刻字或书写，我国古代文献有过记载。《庄子·徐无鬼篇》：“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韬。”《素问》：“著之玉版，每旦读之，名曰玉机。”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只有特殊的人和特殊的场合才使用。出土实物仅有罕见的几例：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济源县曾出土过战国有字玉简<sup>③</sup>，其珍贵自不待言。再有就是若干年前殷墟发现过玉版甲子表残片<sup>④</sup>，一九五二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二号战国墓的祭坑中发现埋有五十枚玉简<sup>⑤</sup>。前者虽只残存两个半字，后者没有任何字迹，但人们也认为是不可多

---

①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济南市博物馆同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②参见伊林著 祝贺译：《黑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③转引自史树青 杨宗荣：《读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参〉笔记》，《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④陈邦怀：《商玉版甲子表跋》，《文物》，1978年第2期。

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得的瑰宝。《旧五代史·礼志》说：“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庙用玉册。”按照这一规定，唐代帝王的陵墓应用玉册。一九七一年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玉册十一片<sup>①</sup>，一九六六年北京丰台林家坟的一座唐墓出土三片比较完整的玉册<sup>②</sup>。这两座唐墓出土的玉册，实际上，其质地一为大理石，一为汉白玉石。一九五一年发掘的南唐二陵<sup>③</sup>，其中开国皇帝李昇陵出土二十三片玉质哀册，是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由于南唐国力衰微，第二个皇帝李璟陵所出的四十片哀册，就是石质的了。可见自古以来玉是一种贵重的东西，即使用于皇太子甚至于皇帝的随葬品，有时也要以石质的材料来代替。

一九六五年底，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中，却发掘出五千余件距今二千四百余年的侯马盟书<sup>④</sup>，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书写在玉片上的。侯马盟书是春秋时期晋国赵鞅和有关国家订的盟约辞文。它的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非常罕见，可充实我国的历史文献；而用这样数目众多的玉片做为书写材料，在书籍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九四二年河南省沁阳一带出土的盟书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春秋晚期正是简册盛行的时候，此时也已使用缣帛。侯马盟书不用简帛而用玉片，这种情况说明，书写材料与书写内容往往有密切的关系。盟约是双方需要严格遵守的，盟辞有纪念意义并需长期保存，书写在玉片上，以表示事件的重大，给予特殊的重视。

下面谈谈最重要的书写材料——西汉纸的发现。世界上自从

①《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②鲁琪等：《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78年第4期。

③南京博物馆编著：《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④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有了纸，才使知识文化传播得更迅速、更普遍。迄今为止，纸是两千多年来的最理想的书写材料。但是在纸的发明者、发明的年代以及谁先首创用植物纤维造纸等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论。国外有些学者所持的“十四世纪德国或意大利发明”说，早为实物例证所推翻；后两个问题互有联系，就是我们自己也惑于古代文献的记载，若干年来甚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没有搞清。《后汉书·蔡伦传》告诉我们，蔡伦在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发明了纸，同时是第一个用植物纤维造纸的人。

我国有好几部历史文献说明在公元前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纸，但无实物佐证，我们只能暂时承认“蔡伦发明”说。国外有个别学者连《后汉书》也撇开，硬说阿拉伯人首先应用植物纤维造纸。直到本世纪初，英国斯坦因先后两次在新疆和长城发掘出东汉和晋朝的植物纤维纸，他们才放弃了这个偏见。问题到此似乎结束了。过了三十年即一九三三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宣帝（公元前73—49年）时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一片麻纸<sup>①</sup>，这个发现，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非常重要，但这片麻纸出土不久即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中日战争的炮火。实物消失，又由于是孤证，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引人注目。一九五七年西安灞桥汉墓出土了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时代的纸<sup>②</sup>，一九六四年经过化验，证实灞桥纸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sup>③</sup>。

由于这一重大发现，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发明纸的光荣应当属于我国劳动人民，当然，蔡伦改革造纸方法的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同时，这一发现把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时间上推了近两百

①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年。

②田野：《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③潘吉星：《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1964年第11期。

年，即是说，我国发明植物纤维纸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掘出两种西汉麻纸<sup>①</sup>，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陕西省扶风县一处西汉窖藏中出土三片可能是宣帝时的麻纸<sup>②</sup>。这些新发现，为我国植物纤维纸发明于西汉这一事实，增添了更多的实物标本。

创造了文字，书写材料由笨重的简牍和昂贵的缣帛发展到纸以后，才为印刷术的发明准备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图象文字和西汉植物纤维纸的发现是书籍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 简 册

我国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刻划和图象文字，象西安半坡村、山东大汶口所发现的，可以说，我们现在还不认识<sup>③</sup>。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主要是为占卜用的，差不多同时的青铜器，其铭文大多属于记事性质，稍后出现的石刻，如石鼓上的文字则是纪念性的，这些虽然都具有史料的价值，与书史有关，但严格说来，都不是真正的书籍，而是一种档案。以上记载文字的材料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并且都掌握在“巫”或“史”的手里。到了奴隶社会的繁荣期，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祖先找到了竹帛这种新的书写材料，以适应新的要求。近年的考古发现，竹帛是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下面先谈简册。

①《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②罗西章：《陕西扶风发现西汉麻纸》，《光明日报》1979年5月30日。

③参看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于先生和唐先生关于大汶口陶文的释义不同。

根据史书记载，可能殷商时代已出现简册了。《尚书·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不过至今尚未发现这时期的实物。最早有实物可证的，是战国时期的。竹木容易腐朽，以前考古发现很少。据统计，解放前发现并见于报道的共有七起，解放后发掘出土的共有二十多起<sup>①</sup>。据统计，七十年代发现的次数最多；从已发现的实物来看，也是这一时期的质量最好，收获最大。在此以前发现的，除了一九五九年甘肃武威东汉墓所出的简书《仪礼》以外（其他片断的书籍不计在内），其余大都是死者随葬器物的清单，即所谓“遣策”。

七十年代发现的主要有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四千九百四十二枚竹简<sup>②</sup>，其中有失传了一千七百余年的《孙臆兵法》，还有《孙子兵法》。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前者就不再见于著录了，以致自宋朝以来对这两种兵法产生种种疑问。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原是一书，甚至有人怀疑孙武本无其人等等。现在这两种兵法同时出土，解决了这个近千年的悬案。在这批竹简中，还有《六韬》和《尉缭子》等人们疑为后人伪托的古书，同样，问题至此也得以澄清了。

该地二号墓中出土三十二枚竹简，系《汉元光元年历谱》<sup>③</sup>，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比西方著名的《儒略历谱》还早八十余年。这份历谱对研究古代历法很有参考价值，并可校正一些古书中的遗误。

同年十一月，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九十二枚汉代医方

---

<sup>①</sup>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文物》1978年第1期，又《文物》1978年第4期补充了四条资料，但仍有遗漏。

<sup>②</sup>《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sup>③</sup>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文物》1974年第2期。

简牍<sup>①</sup>，也是极为重要的收获。由墓葬时代推算，这批医方比东汉末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要早一、二百年，时代仅次于马王堆三号墓的帛书本和简书本医书，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内容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之一。

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在甘肃居延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工作，获得二万余枚汉简<sup>②</sup>，这是我国历来发现古代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内容丰富，可说是一部汉代编年档案史料集，是研究汉代历史的宝贵原始资料。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余枚<sup>③</sup>。这是秦代竹简的首次出土。其中重要的有秦代的律令及秦昭王元年至始皇三十年的大事记等。秦代法律早已失传，这次发现的是我国最古的法律条文。秦昭王至始皇的大事记，逐年记载了秦统一全国的历次战争，其中还记载了一些人的事，具有年谱性质，是后来年谱的雏型。

一九五九年竹木简《仪礼》的出土，已经使我们对古代简册制度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sup>④</sup>。近年来，竹简大批出土，同时由于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考古发掘，竹简出土时一般都尽量使其保持原始状态，以便取得完整准确的科学资料，从而对简册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澄清了一些学者因误解文献而产生的种种错误推测。

从现有实物来看，关于简策的长度，先秦与西汉初期，似无定例；自西汉后期始，才形成一些制度。

①《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2期。

②同287页注①

③《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6期。

④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叙论三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文物出版社，1964年。

西汉桓宽《盐铁论·贵圣编》：“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可是湖北睡虎地十一号墓秦代法律条文的长度，如按二三·三厘米为汉尺一尺的话，只合一尺二寸。临沂银雀山二号墓《汉元光元年历谱》长六十九厘米，将近汉尺三尺。以前敦煌所出汉木简元康三年、神爵三年等同是西汉历书，却又短得多，还不到这长度的一半。属于西汉早期的马王堆三号墓所出二百枚竹木简，有三种长度：二十二·四厘米、二十三厘米和二十九·八厘米。这是同地同墓出土的，内容又同是医书，竟然有这样差别。

东汉王充《论衡·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书解篇》又说：“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是说，经书是二尺四寸长简，而诸子书是一尺短简。东汉武威简书《仪礼》，甲本和丙本长度在五五·五——五六·五厘米之间，差不多等于汉尺二尺四寸，乙本则不足。武威旱滩坡东汉早期墓的医药木简长二三——二三·四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

以上所举的只是少数典型例证，西汉初期以前的简册也有合于文献所说的尺度，西汉后期以下的也有不合的。大多数简册不管内容属于那一类，其长度总与文献记载不尽相符。

关于遣策的长度，什么时代什么人应当多长，也好像没有规律，大多数长度为汉尺一尺余，但是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擂鼓墩一号墓出土曾侯乙的遣策竟长至七十五厘米<sup>①</sup>，相当汉尺三尺二寸多，这是目前所知最长的遣策。

要合理解释简册长度的这种种现象，还有待于今后更多的发现。

简册究竟有几道编纶？汉许慎《说文解字》“册”下注：“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九三〇年在甘肃居延发现的

---

<sup>①</sup>《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光明日报》，1978年9月3日。

简册《汉永元兵物簿》确实有二编之形<sup>①</sup>，所以当时人们一直以为简册只有两道编纶。武威简本《仪礼》、王杖十简和日忌杂简的出土，以实物例证显示了简册可以有两道至五道编纶。

一般的简册大多是两道编纶，尤其遣策如此。如江陵凤凰山八、九号汉墓所出<sup>②</sup>。甘肃居延新出土简册的编纶有两道也有三道，其他如银雀山《汉元光元年历谱》有四道编纶，睡虎地秦简、《孙臆兵法》、马王堆医简等都有三道编纶。相反，还有少于两道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的七十四枚木简<sup>③</sup>只有距简首七厘米处有一道编纶。可见《说文》指的二编之形，仅指其通常情况而言，而编纶的多少是依简的长度而定的。

简册的形制，对后世书籍的影响深远，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铅印本中，也还可找出其中前后承袭的关系。

武威旱滩坡医简中有两枚空白简，是编联在最前面的，叫做首简或赘简，做保护以下的有字竹简之用。这就是后世书籍扉叶的起源。有的首简背面标有篇题，例如《仪礼》、《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这说明简册是以卷画式的收卷，以最后一枚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象现在画卷一样地卷起，因而首简卷在最外层，为了不用打开即可知此卷内容，于是就在首简的背面写上篇题。现代画卷的题签、书籍封面上印的书名，就是这种制度的演变。简册这种收卷方式，其实早在一九三〇年居延烽燧遗址的《汉永元兵物簿》出土时的原始状况展现出来了。这册由七十七枚简编成的兵物簿出土时是裹作一卷的。我们假定一下，由于这情形前所未有，可作孤证，不予科学上的承认，而河南辉县玉简出土时虽相次成卷，但该简无字，可属例外，武威简本《仪礼》

①劳榘编，《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年。

②《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③《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是据出土时的散落状态推测的，也可认为事属武断，但是近年出土多起成卷的简册，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马王堆三号墓的二百枚医简，出土时分卷成两卷，云梦睡虎地秦墓的五十三枚大事记出土时卷成一卷，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七十四枚遣策木简出土时成卷状，甘肃居延新发掘的《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出土时亦成卷状。实物例证说明可能“卷”并不始于帛书，也不一定指的就是帛书。

秦治狱案例每条开端都有小题，《孙臆兵法》末简有尾题和总计本篇字数，《孙子兵法》末简也有字数，武威医简有尾题，武威木简甲本《仪礼》甚至在每枚简末端标上叶数……。这些制度直到清代的线装书还继承着，有些则绵延到现在，或以更完美的形式出现于现代铅印本的书中。但简册制度中的一些优良传统在印刷术发明后反而中断的情况也有。很多简本书籍大都有标点符号，例如武威医简有表示起头、另行、结尾的符号，《孙臆兵法》有起句符号，甚至连《侯马盟书》的玉石片上也有合文、重文符号和四十七例句号。后来的刻本书籍中除了极少数有必要的如有章句标抹的书保留这种制度以外，绝大多数逐渐被删去，给后人阅读古书造成很多困难，为了辨明句读，清代很多考据学家、校勘学家化费了几十年甚至毕生的精力还有弄不清的地方。

## 帛 书

人们使用简册著书立说，经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发现我国早已发明的丝织品做为书写材料更为轻便，于是出现了帛书。《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可知至迟在春秋时期竹帛已经并用。帛书尤其不易保存，考古发现极少，纵然出土，也是碎片，不能据以考察帛书的形制。

帛书与简书一样，存在时期相当长，《北堂书钞》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段史料说明，距纸发明已有四百余年的魏晋之际，帛书仍在流行。

由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图书篇卷并列，而其时又竹帛兼用，所以很久以来人们认为篇指简册，卷指帛书。在过去，关于简册形制，上古文献中还有些记载，至于帛书形制，则属寥寥，只能根据隋唐以后文献上有关纸的卷轴形制的记载来推测。

一九七四年初，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二十多种共十二万多字的帛书<sup>①</sup>。这是考古史上空前的一次大发现。其中有许多失传了一、二千年的古佚书，有的史料甚至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人没有见过，为研究西汉早期的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方面，提供了新资料；有的与传世的通行本有很大差异，可据以校正很多史料。这批帛书的出土，是文献学、校勘学、版本学上的重大收获，而对于书籍发展史的研究来说，更是一批极为难得的珍贵资料，为帛书形制以实物例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与缺失。

一九四二年九月长沙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了一件世界著名的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sup>②</sup>，对这种情况，也和简本《汉永元兵物簿》一样，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认为是个孤证，或许出于偶然。但这次马王堆帛书出土时的原始状况，除了少数卷在二、三厘米宽的竹木条上以外，大部分折叠为若干幅的长方形，都没有轴。根据这种情况，至少自战国至西汉早期帛书并未形成卷轴，用较宽的竹木条卷起，也只能说是卷轴制度的发轫，所以帛书的时期，可以说是向卷轴过渡的阶段。

<sup>①</sup>《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sup>②</sup>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帛书的高度，大致可分四十八与二十四厘米两种，但也有少数二十三或十八厘米的，合汉尺二尺多或一尺左右。但那种书写在那种尺度上，似无严格规定，如《老子》甲、乙本，同一部书，就是分别写在四十八和二十四厘米高的帛上的。这也可见西汉初期帛书的尺寸与简书一样，并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帛书其它方面，象题记方式、尾题、卷末注明字数、标点符号、分篇提行等，都与简册基本相同<sup>①</sup>。

书籍发展到竹帛时期，才算是出现了正式的书。许慎《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竹，普遍易得；帛，轻软方便。由于书写材料的进步，这时，各家著作蜂起，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想缜密、文辞优美的精神财富。

流传到今天的古书，很多都是竹帛时期的著作，同时，竹帛时期的书籍制度，给予后世极大的影响，所以简册帛书在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应大力开展研究，全面地掌握其发展规律。

## 朱墨写本与版画

我国雕版印刷术自唐朝发明以后，经过宋朝三百余年的不断实践、提高，发展到元朝，出现一项创新，就是发明了套印术。

现存最早的套印本是元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无闻和尚注的金刚经<sup>②</sup>，经文和扉画中的灵芝图用朱色，注语用墨色。

套印术创始的确切年代，现在尚未考证出来，但刻写或书写

---

<sup>①</sup>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1期。

<sup>②</sup>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是朱墨套印本，王重民老师认为是一版涂上两种颜色印成的。此书现存台湾，无从鉴定，今暂从众说。

采用墨色以外的朱色，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一块大陶缸残片上的刻文，就涂有朱红的颜色<sup>①</sup>。往后，殷墟甲骨文的刻痕里有的填以朱色，或有朱色字迹尚未镌刻，侯马盟书绝大多数是朱书，东汉熹平石经在雕刻前是蔡邕用丹将七经先写在石碑上的。至于在帛上朱书，文献记载就更多了。

什么时候朱墨合用于一本书呢？现知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汉贾逵（公元30—101年）著的《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sup>②</sup>，这大概是用朱墨两色分别书写“经”和“传”的。

追寻有关现存实物的踪迹，我们可以探讨出套印术产生的原因。

敦煌遗书中的写本《道德真经疏》，经文朱书，疏语墨书。五代刻本《大唐刊谬补阙切韵》，在变反切时，正字上有用毛笔点的红点。在现存一些南宋刻本中的注疏标抹等盛用阴文、墨围、花纹或其它符号与正文相区别。

仅从这几例实物，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著作，由于流传的年代久远，越到后来内容越不易弄懂，再加上抄写翻刻的次数频繁，鲁鱼亥豕，比比皆是，所以很多古代著作都有注疏批校，抄写刻印起来，极易与正文相混，需要有所标记。写本时代可用不同的颜色分别书写，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则以人工用朱笔另行点抹，当然这方法太费事了，于是采取阴文、墨围、另行、小字双行等措施，进而在同一块版上涂不同的颜色刷印，最后终于导致套印术的发明。这是套印术产生的大致过程，所以套印本渊源于套写本。

长沙战国楚帛书的文字部分，用朱色长形小方框做为分段标

<sup>①</sup>任日新：《山东诸城县前寨遗址调查》，《文物》，1974年第1期。

<sup>②</sup>《隋书经笈志》卷一。

记，这是现存最早的朱墨写本。

马王堆帛书，大部分都有朱丝栏，而驻军图不仅用朱色画出军事要素，墨色标绘山脉，还用田青色表示河流，这已经是三色写本了。这些实物证明，朱墨写本的存在，早于文献记载，至迟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初。楚帛书早被帝国主义掠走，所以马王堆帛书显得更为珍贵。

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和套印术，都是我国首先发明的。文字辅以图画，使书籍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这项首创的光荣大概也是我国独享的。书籍称为“图书”，说明我国历来图文并茂。现存第一部书目《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书籍很多就是带图的。

唐咸通刻本《金刚经》闻名于世，不仅因为是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同时也因其扉画《祇树给孤独园》说法图是世界现存最古的版画，这说明我国版画起源之早。

雕版书中的版画，与雕版印刷术本身一样，开始是为宗教服务的，到了宋元时代，才逐渐面向其它书籍，大量应用于文艺书籍，则又在稍后。到了明代，随着雕版手工业因商业资本开始发达呈现繁荣景象，版画也发展到鼎盛时期。特别是此时戏曲、小说的插图，真是百花齐放，绚丽多采。可惜的是，由于封建士大夫不屑注意，藏书家也鄙夷这类书籍，失传了很多。尤其是明初的作品，造成了戏曲小说史和版画史上的缺失。

郑振铎先生编辑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明初版画集》自称“网罗尚称完备”，“搜集洪武至正德（公元1368—1521年）一百五十余年年间所镌之插图书籍凡二十六种”<sup>①</sup>。其中没有一种是小说戏曲。这类书的罕见可想而知。

---

<sup>①</sup>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二册说明。

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一个宣姓墓中出土了十二册唱本、传奇<sup>①</sup>。这批书是北京永顺书堂刻于明成化七年至十四年（公元1471—1478年）之间的。过去任何藏书目录都不曾著录。它们的出现，弥补了戏曲小说史特别是版画史上的空白。早年流入日本的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金陵刻本《娇红记》是现知存世最早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版画。除此以外，上海新发现的这批书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了。

这批明初的版画，从其绘刻风格、插图版式来看，是承上启下的，如《花关索传》每页都是上图下文，仍具宋元传统；其它如《刘智远还乡白兔记》等都是整页插图。这表明版画发展到明初，需要大幅充分表现内容，同时说明这项艺术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对以后版画的繁荣，影响很大。

由朱墨写本或多色写本发展为套印本；套印的技术施于版画，就为印刷术开辟了新的蹊径。到了明代末年，胡正言在南京就创造出短版、拱花这种“化旧翻新，穷工极变”<sup>②</sup>的巧技来，使彩色套印的木刻版画放出夺目的光彩！用这种方法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sup>③</sup>，达到了当时印刷工艺的高峰。基于这种意义，马王堆的三色古写本地图与上海出土的明成化间的唱本、传奇的版画，在书籍发展史上是值得重视的文物。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丰富多彩的有关书史的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书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例证，可以冲散一些疑雾，可以推倒一些主观臆测，可以订正一些文献记载的谬误。更重要的，是把书史中某些发明创造推前了很多年，使书史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书籍发展的真实过程。

①《上海发现一批明成化年间刻印的唱本、传奇》，《文物》1972年第11期。

②胡正言，《十竹斋笺谱·李克恭叙》，明崇祯十七年胡氏十竹斋刻彩色套印本。

③画谱只用短版，笺谱兼用短版和拱花。